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1/710 *
9 January 198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

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何塞·安东尼奥·帕斯托·里德鲁埃霍教授按照 1986 年 3 月 12 日委员会第 1986/39 号决议第 12 段规定编写的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报告。

* 为了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87-00613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按照
委员会第 1986/39 号决议第 12 段的规定
编写的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 导言	1 - 17	3 - 6
二、 一般政治情况	18 - 25	6 - 7
三、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26 - 61	7 - 16
四、 公民和政治权利	62-119	16 - 30
五、 难民及流离失所人情况	120-132	30 - 34
六、 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133-163	34 - 42
七、 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切	164-178	42 - 45
八、 结论	179-187	46 - 47
九、 建议	188-192	48

一、导言

1. 大会在关于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1980年12月15日第35/192号决议内,表示严重关切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受到严重侵犯,并对该国国内人权情况某些方面感到痛惜。此外,大会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

2.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在委员会题为“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殖民地及其他附属国家和领土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害问题”的议程项目13下审议了萨尔瓦多的情况。委员会就这个项目进行辩论后,通过了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权遭受侵害问题的第32(XXXVII)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内请其主席与主席团进行协商后,任命委员会特别代表一人,其任务为根据来自一切有关来源的资料,审查关于萨尔瓦多境内发生的谋杀、劫持、失踪、恐怖主义行为和一切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事件的报导,并就其调查结果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该决议还请委员会特别代表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

3. 按照人权委员会委托的任务,特别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初步报告(A/36/608,附件)。1981年12月16日,大会通过了第36/155号决议。

4. 1982年,特别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最后报告(E/CN.4/1502)。1982年3月11日,委员会通过了第1982/28号决议,延长特别代表任期一年。

5. 此后,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审查了特别代表的下列报告:A/37/661,附件;E/CN.4/1983/20;A/38/503,附件;E/CN.4/1984/25和Corr.1,和A/39/636,附件,并每年延长其任期。

6.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第四十和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1983/29,1984/52和1985/35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届会议也继续审议了这个问题(第36/155,

第37/185, 第38/101和第39/119号决议)。

7. 大会在1985年12月13日第40/139号决议中赞扬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85/35号决议编写的报告(A/40/818, 附件)。

8. 1986年3月4日, 特别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他的最后报告(E/CN.4/1986/22)。

9. 1986年3月12日, 人权委员会以39票对零票, 4票弃权, 通过了第1986/39号决议。在此决议中, 委员会除其他外, 决定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 希望今后萨尔瓦多的人权情况能够继续改善, 并请特别代表就萨尔瓦多人权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和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特别报告员曾经在他过去的报告中提到萨尔瓦多在1979年第四季以及在1980、1981、1982、1983、1984和1985年间的人权状况。在本报告中, 特别代表主要将报导1986年的人权情况。但是应当指出, 在早先的报告与本报告之间有一个自然的连续性, 所以在审议本报告时应当互相参照(见第3-5段)。

11. 正如过去一样, 萨尔瓦多政府对本报告的编写给予充分合作。对此, 特别代表深表感谢。合作的事项包括准许特别代表入境, 并能够毫无拘束地访问想要访问的地方, 虽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他无时无地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不过, 由于萨尔瓦多政府在法律上仍然对特别报告的任务有所保留, 所以他的访问是以西班牙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以特别代表的身份进行的。

12. 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得到该国其他组织的合作, 这包括教会、武装反政府力量、人权组织、私人社团与个人。对这些合作, 特别代表再次表示感谢。

13. 特别代表于1986年9月21日,星期日,到达萨尔瓦多,然后在那里留到9月27日,星期六。在这段时间中,他与下列官员进行了谈话:共和国总统何塞·拿破伦·杜亚蒂阁下;外交部长 Ricardo Acevedo Peralta 先生;议会主席 Guillermo Antonio Guevara Lacayo 先生;最高法院院长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先生和其他法官;司法部长 Julio Samayoa 先生及刑事调查委员会总干事 Luis Domínguez Parada 先生;内政部长 Edgar Bellosio Punes 先生;教育部长 José Alberto Buendía Flores 先生;劳工及社会保险部长 Miguel Alejandro Gallegos 先生;国防部长 Carlos Eugenio Vides Casanova 将军和主管公安的副部长、参谋总长和国家安全部队指挥;共和国总检查官 José Francisco Guerrero 先生;中央选举理事会会长 Mario Samayoa 先生;萨尔瓦多法律审查委员会会长 Ernesto Criollo 先生;空军总司令 Adolfo Bustillo 将军;以及军事法庭第1、2和3初审庭的永久成员。

14. 在萨尔瓦多,特别代表并与下列人士进行了谈话:主教会议成员;圣萨尔瓦多大主教 Rivera y Damas 阁下;萨尔瓦多天主教大学校长 Ignacio Eyacuria 神父;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执行秘书 Benjamin Cestoni 先生;大主教管区法律保护办事处主任 Maria Julia Hernández 夫人;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代表;萨尔瓦多境内因政治原因被拘或失踪者亲戚争取其自由委员会代表;萨尔瓦多境内因政治原因被拘、失踪或被杀者母亲和亲戚委员会代表;萨尔瓦多工人民族团结工会代表;工农民族团结工会代表;萨尔瓦多律师 Alfred Martinez Moreno 先生;和欧美两洲各国的外交代表。

15. 特别代表访问了 Mariona 和 Ylopango 监狱,在那里完全自由和秘密地随意与许多政治犯谈过话。他并访问了萨卡特科卢卡,在那里与自战区疏散的农民谈了话。在圣萨尔多大主教管区,他听取了法律保护办事处、法律协助办事处和人权委员会(非政府)提供的多至22个证人的证言。

16. 1986年6月,特别代表与法律协助办事处一位代表在马德里谈话。 1986

年7月，他在同一城市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和外交委员会一位代表谈了话，并于1986年9月在纽约与这位代表进一步谈了话。

17. 最后，特别代表于1986年10月在纽约与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一位代表谈了话，并与美洲监视会(Americas Watch)一位代表谈了话。

二. 一般政治情况

18. 如同以前的报告一样，特别代表提议在这一部分报告中汇报1986年对人权尊重情况影响最大的一般政治问题。

19. 特别代表首先指出，萨尔瓦多的戒严状态仍在持续，并由会议根据宪法月复一月的一再延长。因此，宪法保障的一些自由权利，即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已被中止。

20. 关于萨尔瓦多合法政府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间的对话，特别代表在以前的报告(E/CN.4/1985/18,第31-39段;E/CN.4/1986/22,第36-39段)里曾就对话的进展提供过广泛的说明，新闻报道¹也曾披露：1986年3月初，杜阿尔特总统给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写了一封信，建议两国同本国的游击队同时开始谈判。根据同一报道，革命民主阵线主席温戈先生于3月11日同意恢复全国和平对话，而且他不愿把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同反政府力量同时进行对话作为先决条件。

21. 根据以后的新闻报道²，杜阿尔特总统在1986年6月发表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邀请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领导人同政府进行停战谈判。这一谈判计划“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在国家领土上于7月底或8月初”举行。7月4日，游击队同意了该建议。此后的新闻报道³证实，尽管政府军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战士于6月中旬在萨尔瓦多东部的米格尔城进行了激战，造成双方的人员损失；但杜阿尔特总统仍打算进行谈判。

22. 为了确定和平谈判的日期、地点和议程，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于8月20日在墨西哥城的某一秘密地点确实举行了几次

秘密筹备会谈；当时参加的还有圣萨尔瓦多的大主教，里维拉·Y·达马斯阁下⁴。会谈中双方同意：于9月19日在圣萨尔瓦多以东150公里一个称为塞索里的地方举行第三轮谈判。

23. 特别代表从国际新闻报道⁵中获悉：杜阿尔特总统于9月19日去了塞索里。尽管他知道游击队的代表不会到场，因为他们的另一要求，即该地区非军事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据报道，杜阿尔特总统当时在塞索里说，他不会同意与游击队进行第三次筹备会谈，但愿意同他们进行第三轮谈判。根据同一报道，就在那天的凌晨，在杜阿尔特总统一行抵达前不久，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距塞索里只有几公里的巴里奥斯城袭击了政府军的阵地。

24. 特别代表认为，他无权就对话的性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地点和内容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这是属于有关各方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然而他却要指出，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都强调要进行对话；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历次决议都表明了这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广大的萨尔瓦多人民希望进行谈判以及最终实现和平。无论是萨尔瓦多合法政府还是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都不能压制萨尔瓦多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因此，特别代表指出，不能把对话用作在战术上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应把它作为目标，即实现和平，或至少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处理冲突。

25. 而且，如同前几年，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会见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他向特别代表详细地汇报该委员会的工作。1986年，该委员会根据立法议会去年5月通过的《选举登记法》重新准备了一个全面准确的选民名册。⁶

三.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6.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的报告，1985年如同1984年，萨尔瓦多经济取得了一点增长（1.4%），从而摆脱了1979年以来的衰退期。但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连续第六年的战争给生产带来损失，并增加了社会负担，造成社会和政治紧张。据报道，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增长

了一倍，往来帐户赤字也有所扩大。然而，财政赤字已大大减少。

27. 从由战争造成的整个形势来看，1985年里有两个现象较为突出。一是企业逐渐适应了形势，从而使一些年来一直下降的生产得到复兴。另一现象是，战争造成，并仍在继续产生着宏观经济影响，例如：迅速的城市化，它激发了新的需求，而对这些需求的满足——尽管是部分满足，促进了诸如建筑等某些生产活动。⁷

28. 该委员会指出，1985年萨尔瓦多经济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援和旅居国外的萨尔瓦多侨民寄往国内的汇款所致。就生产来说，除了农业部门，所有经济活动的营业额都出现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有所扩大。据报道，住房建筑、制造业和贸易都取得增长，只有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影响了国内产品消费和出口。出口还受到国际市场萧条及战争的影响。⁷

29. 至于主要出口作物，即咖啡、棉花和糖，人们希望，由于1986年咖啡豆价格的上涨，咖啡产量将会增加，尽管政府正在考虑以发放债券方式延迟出口商的收入，从而减少经济中的盈余资金流动。⁸ 由于国内的战争状况以及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下跌，1985年棉花产量同1984年相比下降了20%。然而糖产量和前两年一样仍继续增加，这是因为耕种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不过糖产量增长速度比以前要低（6%）。⁹

30. 根据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于1986年9月26日亲自交给特别代表的报告，¹⁰，萨尔瓦多政府在实施一项稳定和复兴经济的计划（经济稳定和复兴方案）。该计划综合了财政、金融和外汇措施。

31. 1985年萨尔瓦多经济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价格比1984年上涨了22%；根据上述报告，这是由于猜测、资金高度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引起通货急剧膨胀。但是，1986年初，价格开始稳定，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985年末的水平。

32. 1986年1月，萨尔瓦多政府开始实行一系列旨在实现收支平衡的经济措施，其中包括统一汇率、改革税收结构、控制进口、限制对公营部门的贷款、增加工资和固定某些战略性商品的价格。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国际收支的赤字，

提高产量和就业，并改善收入分配。

33. 在个人购买力方面，该报告指出，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2.1%，它导致科朗的购买力至1985年12月下降了35分，而且在同一时期，占家庭开支约50%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7.9%，服装价格上涨23.9%，而整个生活费用上涨了32.1%。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从1979年至1985年没有任何变动；商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在1984年根据杜阿尔特总统的经济计划被提高之后，就没有任何变化。

34. 1986年2月1日，农业、商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得到增长。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从1985年的5.20科朗增加到1986年的8科朗；童工和残疾者的最低工资从4科朗增加到7科朗。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圣萨尔瓦多的最低工资从13科朗增加到15科朗，在全国其它地方则从11.90科朗增到14科朗。但是，据报道这些提高的工资措施并没有促进购买力的增长，因为整个价格指数已上涨。

35. 根据政府的稳定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各项：

(a) 把汇率统一定为1美元兑换5科朗；

(b) 禁止进口奢侈品，对咖啡出口的额外利润征收附加税，免收医药品和食品的印花税，免除公共汽车的进口税，消减经常性开支10%；

(c) 提高燃料价格；

(d) 增加给私营部门的贷款936,800,000科朗，有选择地疏通贷款渠道，把较多的资金贷给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部门，以提高产量和就业水平；

(e) 增加农村地区、以及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最低工资；

(f) 暂时冻结必需品和基本服务项目的价格；

(g) 实行紧缩公营部门开支的方案。

36. 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修改1986年1月23日批准的《销售和价格管理法》，并在中央储备银行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吸引目前在银行体系以外被管理的资

金。

37. 在以前的报告中，特别代表曾详细介绍1980年革命政府执政团实行的土地改革计划。应当回顾的是，根据于1983年12月15日通过并于当年12月20日开始生效的宪法第一〇五条，萨尔瓦多的任何个人或法人最多可拥有245公顷的农场，也就是说，土地改革计划的第一阶段不包括大于245公顷的农场。

38. 根据特别代表获得的资料，土地改革计划的三个阶段“……当前涉及到26%的农村贫民和22%的农田。至今，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已把469个大农场变为517个合作社，受益的合作社成员达31,000人。在第三阶段中，有240,000多公亩的农田被分给65,782户以前的佃农。在土改的第二阶段里，拥有605公亩以上的地主必须在1986年12月之前出卖其土地，否则就得被征用，并得不到事先补偿”。¹¹ 第一阶段的合作社遇到的主要财政问题是土地改革的债务。据报导，有多达95%的第一阶段合作社无法履行还债义务。他们因土地费、紧急贷款和投资以及生产借贷所需偿还的债务估计约为8亿美元。

39. 根据共和国总统给特别代表的报告，1985年6月至1986年7月期间，萨尔瓦多土地改革研究所（土改所）采取了加速土改所涉土地的付款和把土地交给受益农民的措施。据报道，杜阿尔特总统指示土改所于1986年底之前解决悬而未决的土地所有权和补偿问题。根据政府的报告，萨尔瓦多政府在土改所和其它政府机构的配合下，促进和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合作社的政策，如提供必要的贷款，销售农产品，给予恰当的技术援助，提供优惠的农业贷款条件（6%的利息率，50年的偿还期，5年宽限期和（或）给予早期支付的利息），特别是，推行社会发展方案，以提高获得土地的家庭的生活和健康水平。¹²

40. 特别代表获悉，在涉及605公亩以上和1,250公亩以下的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地主们必须在1986年12月之前出售其足出605公亩的土地部分，

否则在该期限之后，超出这一限额的土地财产就会被不予补偿地没收。 预计到第二阶段完成时，出售的私有土地将达 41,000 公亩。 至于被称为“给农民土地”（最多 17 公亩）方案的第三阶段，“最近通过的对萨尔瓦多登记法的修正应能加速全国农业土地筹资所（土资所—FINATA）进行的确定所有权的工作。 1986 年 2 月第三阶段的直接受益者共为 63,669 人，包括家属达 382,008 人，所涉土地为 240,054 公亩，颁发的临时地契为 65,900 份”，还有给 17.56% 受益者的永久地契，“另外有 1,622 户地主获得补偿”。¹³

41. 特别代表在访问萨尔瓦多期间会见了全国工人和农民联盟（工农联盟）——农民和合作社社员的工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告诉特别代表，他们认为土地改革取得了进展，现在农民有了土地，而这是 1979 年以前没有的事。 他们还说，土改取得了 90% 的成功，如今他们在合作社有学校和医务所，因此他们能够使孩子们受教育，并能享受医疗服务。

42. 据报导，武装冲突仍在影响着土改合作社的生活。 由于战争，已有 50 个合作社被整个或部分地放弃，其他合作社也都遭受直接或间接损失。

43.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向特别代表提供的资料，¹⁴ 1980 年至 1986 年 7 月期间，有 704 名土改合作社工人死于暴力，还有 128 人受伤，48 人失踪或被绑架。 根据同一消息来源，暴力行动于 1982 年开始减少。 1980 年至 1986 年 7 月期间，全国性暴力行动给土改地区造成的损失共达 3,150 万科朗（约合 630 万美元），萨尔瓦多东部地区受害最深。 在这 3,150 万科朗的损失中，被破坏或遗弃的农作物为 1,690 万科朗（约合 338 万美元），经济基础设施受损 610 万科朗（约 122 万美元），农业机械和办公设备受损 380 万科朗（约 77.6 万美元）。 总共价值 867,070 科朗（173,415 美元）的已收获作物在仓库里被毁，其中棉花占 29.6%，咖啡和糖也占很大比例。 特别代表注意到这些供出口的农产品损失会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根据提供的资料，土改合作社每年要从其生产贷款中拿出 190 万科朗（3.8 万美元）用于安全保护。

44. 特别代表还注意到萨尔瓦多的经济处于资金外逃、人才外流、信心丧失和投资减少的状况，电力削减和交通阻塞地造成了损失。

45. 拉加经委会认为，在1985年最低工资没有变化，从而延长了1980年开始的实际报酬下降的势头。在1980—1985年期间，就业所得的实际收入减少可能达45%或50%之多。在1985年下半年，这种局势触发了劳工运动，尤其是公营部门的劳工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争取审查工资，公营部门大约40%的雇员停工，结果公务员在12月份获得150科朗的特别加薪，作为年终奖金的一部分，工资名义上增加17%，每月不到1500科朗。自1986年2月以来，这类工资增加已成为一整套工资措施的一部分。总之，在1985年名义工资没有变化——对某些部门而言已经是在连续第五年了。这就意味着工人的购买力下降了大约23%。¹⁵

46. 国际新闻界¹⁶对该国劳工动乱，包括对1986年2月8日成立萨尔瓦多全国工人联合会一事进行了报导；全国工人联合会是由反对政府紧缩政策的各种工会组成的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中立工会与左翼工会进行联合这还是第一次，甚至杜阿尔特总统以前的支持者也参加了联合阵线。2月21日，新成立的联合会举行了六年来最大的抗议游行。在1986年5月1日举行的另一次示威中，¹⁷15,000至20,000名工人在圣萨尔瓦多参加了游行，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建筑工人、学校教师、大学生和一些公务员抗议政府制定的紧缩政策。

47. 萨尔瓦多劳工和社会保险部长通知特别代表，在1985年6月至1986年9月之间私营部门发生过54次罢工。其中一次罢工于1986年5月26日在联合工业股份公司发生了暴力事件。在这次被司法部门宣布为非法的罢工中，一些工人占据了工厂，不让他们的同事进厂，从而违反了《劳工法》第13条。厂方召来了国民警卫队，以和平方式驱逐了罢工工人。

48. 劳工部长还通知特别代表，在上一段提到的那个时期中，公营部门也发生了罢工，违反了禁止这类罢工的《宪法》第221条。受到这类罢工影响的国家机构有：

萨尔瓦多社会保险局、国家电信管理局、财政部、邮政总局、萨尔瓦多旅游局、公共工程部、农业和牲畜生产部以及供水和污水管理局。

49. 萨尔瓦多的劳工动乱导致工会会员遭到逮捕。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会见了其中随后被释放的一些被捕者；他们说自己在非法审问中受到严重的心理压力，关于这一情况将在有关章节加以叙述。

50. 在这方面，特别代表建议从有关马蒂民解阵线有组织地破坏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许多报告中挑选一些报告进行复印。萨尔瓦多当局再次向特别代表提供了有关这类行动的详尽资料，包括总页数多达1,200页的五份文件，这是国防和公共安全部呈交给在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的。由于这些文件很长、很详细，不可能全部加以复印，因此，特别代表将扼要加以引述，并且还要加入国际新闻界和其他来源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51.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¹⁸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文件指出，革命民主阵线各组织在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造成的破坏可归纳如下：对公有和私有运输工具进行了50次攻击，其中对私有运输工具攻击机动车8次，公共汽车20次，载重汽车2次，攻击方式为机枪扫射（16次）、伏击（2次）、放火（6次）和轰炸（6次）；对公有运输工具：攻击机动车2次，火车16次，载重汽车2次，攻击方式为放火（17次）和轰炸（3次）。同一资料来源还指出发生过五次交通阻塞。对私有财产造成的破坏如下：攻击私有财产33次，包括农业合作社、农场、庄园和一架洒水飞机，侵袭农作物和毁坏种子；攻击经济和/或商业部门21次，包括袭击商店3次、私人住宅9次（4次袭击、3次机枪扫射和2次轰炸）等等，攻击银行机构3次、仓库3次，攻击小村庄15次，其中有4次村民被抓，7次村庄遭到洗劫。其他事件包括对政府机构和/或办事处的攻击：袭击消防站1次、国家电信管理局办事处5次，枪击法院2次，攻击市政厅4次，枪击统计和普查大楼一次，攻击学校3次。

52. 根据当局在特别代表访问萨尔瓦多时向他提供的资料，¹⁹在1985年9

月1日至1986年7月31日期间国营电力公司遭到游击队1,035次的攻击和2次武装攻击,游击队摧毁了66座铁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根电线杆或一个临时建筑物要被炸毁10次以上)、541根电线杆、45个配电变压器、位于拉巴斯省拉埃拉杜拉变电所的变压器和位于拉利伯塔德省阿特奥斯变电所的变压器。

53. 1986年2月2日,森顺特佩克圣拉斐尔·塞德罗斯的两位工人去修复前一天晚上被炸毁的一根输电线杆时被附近一枚马蒂民解阵线埋设的地雷炸成重伤。对国营电力公司的破坏,包括破坏铁塔、电线杆、变压器、基础设施和变电所设备,造成了总数达96,105,856.79科朗或19,221,171.36美元的损失。同一资料还指出,国营电力公司在1980年8月19日至1986年7月31日期间遭到的损失总数达227,919,834.24科朗或45,583,966.85美元。在同一时期,游击队攻击国家电信管理局的财产,包括破坏电话线、设备、电缆、车辆、公用电话等等,加上额外的安全人员的费用,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总数达52,352,042科朗或近10,460,408美元。

54. 根据拉加经委会的估计,尽管战争破坏了向圣萨尔瓦多提供电力的一些发电和配电系统,但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需求量增加,除了提供基本服务外,发电量还是增加了6%。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破坏,只得在下半年动用应急发电机,并使电力分配合理化。²⁰

55. 特别代表还注意到这种广泛破坏对经济造成的间接损失和对工业、商业和公营部门的产出造成的不利影响。

56. 根据国防和公共安全部提供的资料,²¹革命民主阵线成员在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8月31日期间犯下的违法行为可概括如下:违法行为总数为1,793起,可分成以下几类:枪击致死158人;地雷炸死28人;枪击致伤54人;地雷炸伤173人;劫持251起;攻击12起;强奸6起;机枪扫射车辆98起;威胁240起;宣传鼓动343起;枪劫423起;敲诈事例9起。同一资料来源还指出,1986年1月18日至1986年6月10日期间四所学校被摧毁;1986年

2月8日莫拉桑圣卡洛斯的一座市政厅被摧毁；2月1日在新格拉纳达的治安法官办事处被摧毁；在1986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发生了20起针对农场、咖啡作物和房舍的纵火案。据报告，工作场所也遭到摧毁。²²特别代表还看了当地的报纸；据报导圣萨尔瓦多抵押银行保管库附近一枚炸弹爆炸使四人受伤；在一次恐怖分子的攻击中，四座高压铁塔被炸毁，使该国东部断电。²³特别代表还得知1986年2月16日游击队员放火烧了萨尔瓦多东部的六个咖啡园。²⁴

57. 在圣萨尔瓦多，武装部队给特别代表一份内有近300份剪报的档案，是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4日期间在萨尔瓦多发生的违反人权的事例的。由于这份文件内容太多，特别代表无法进行详细复述。

58. 特别代表还收到有关马蒂民解阵线在交通阻塞时向车辆射击造成死亡的资料。在这方面，美洲监察组织报告说马蒂民解阵线对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不加区别，并提到法律保护办公室得到的资料；据该资料，1985年7月至12月期间由于这种做法而使13人死亡²⁵。《国际先驱论坛报》也报导了这类死亡事件²⁷。美洲监察组织还注意到1985年9月在杜阿尔特总统的女儿伊内斯·杜阿尔特被绑架时发生的一次交通阻塞中，“在萨尔瓦多东部马蒂民解阵线使一辆救护车中途返回，从而造成一名等候救护车的年轻姑娘死亡。”²⁶

59. 其他关于马蒂民解阵线破坏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报告包括以下资料：1986年2月26日，游击队员在萨尔瓦多南部摧毁了该国一个最大的棉花合作社，“……杀害五名士兵，打伤三人……”²⁸

60. 根据其他资料，1985年该国的电力分配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公共交通的损失也比1984年大，“……尽管破坏的程度比1979-1983年低得多”，这一时期对该国主要出口作物的破坏似乎也比往年少。但同一资料指出，“自1979年以来，叛乱分子破坏经济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15亿美元。”²⁹

61. 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导，“叛乱分子的违法活动包括日益增多的

就地处决，对公路交通的攻击，几十起绑架事件和滥用地雷等活动对平民造成很大伤亡，或许比军队轰炸造成的伤亡还大。”³⁰

IV. 公民和政治权利

62.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关于萨尔瓦多境内违反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各种资料。鉴于这类资料的性质，很难对照在人权领域对萨尔瓦多共和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对资料进行详细的批评性审查，因此，特别代表在以前的报告中认为最好采用不同的方式，即就全面考虑最严重的违反人权事件和这类违反人权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分类。这种分类绝对不意味对各种类型作僵硬的区分；分类如下：(a) 谋杀；(b) 逮捕和失踪；(c) 政治犯；(d) 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现状；以及(e) 与游击队有关的违反人权事例。

A. 谋杀

63.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有关出于政治动机谋杀或就地处决非战斗的平民的资料。特别代表知道，如同前几年一样要准确地确定这类犯罪的次数是困难的，造成这种困难有各种原因。首先就是调查方面的困难，在作战地带更是如此。第二个原因在于其中一些数字很高，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数字还是比往年低。第三个原因就是听到发生谋杀事件往往是在发现尸体之后，因此很难确定谋杀是出于政治动机或仅仅是普通的犯罪。最后一个原因是各个资料提供者采用的方法不同，从而使困难更复杂。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特别代表认为在确定对非战斗人员的政治性谋杀的数字时需要极其谨慎，因为无法确信上报的政治性谋杀事件的数字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际数字。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有时很大，因此很明显需要谨慎从事。

64. 特别代表根据法律保护办公室³¹提供的数字减去了在车队对平民胡乱攻击中受害的人数，这类受害者将在其他部分讨论。因此，1986年被谋杀的非战斗人员的人数如下：

	<u>暗杀队</u>	<u>军队</u>	<u>保安部队</u>	<u>民防部队</u>
1月	4	2	-	5
2月	5	4	-	-
3月	1	3	-	-
4月	9	6	2	-
5月	4	3	2	-
6月	3	6	2	1

65. 基督教法律援助社²²认为在1986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暗杀队和准军事组织,以及武装部队成员任意处决了49人。该社并没有指明究竟谁该对这些任意处决负责。此外,这个数字比法律保护办公室为同一时期提供的数字高得多。

66.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提供的1986年1月至5月期间非战斗人员死亡数字要低一些: ”

	<u>与武装部队成员有关的</u> <u>平民死亡数</u>	<u>由于不明身份人员的行为</u> <u>造成的平民死亡数</u>
1月	3	6
2月	1	6
3月	1	7
4月	3	9
5月	1	20
6月	6	9
7月	0	9

67. 此外，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³⁴ 根据新闻界提供的资料就与政治暴力有关的平民死亡人数提出了更低的数字：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被极右份子谋杀	0	0	0	0	0
可能被极右份子谋杀	0	0	0	2	3
被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谋杀	7	4	2	9	2

68. 特别代表注意到他引用的统计表包括了与“暗杀队”、“不明身份人员”或“不明身份的攻击者”有关的被谋杀人数。显然，这些谋杀事件的责任不在萨尔瓦多政府。只有当犯罪者与政府官员有联系或受到他们的保护或纵容时，政府才应该承担责任，很明显1985年以前的那些年就是这样的。至于在1986年暗杀队可能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何种程度的支持或纵容，特别代表无法得出确凿的最后结论。特别代表认为现在支持或保护上述组织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是高级官员或高级军官。

69. 因此，以上就是特别代表得到的统计表；他在向大会提交这些统计表的同时指出，尽管各种来源提供的数字可能不同，但是在这些数字中有一个重要的集中点：在1986年被政府官员和可能被极右翼准军事集团政治性谋杀的人数大大低于1985年，从而肯定了自1984年6月杜阿尔特先生作为共和国宪法总统执政时开始的那种下降趋势。特别代表提请注意这种持续的下降趋势，同时希望萨尔瓦多尽快彻底消除就地处决的现象。

B. 逮捕和失踪

70. 特别代表继续获悉了有关因政治原因受到逮捕的人的消息，据报告，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失踪，特别代表并且如同他上一次报告一样指出，希望极其审慎的看待有关的数字。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人遭逮捕或者绑架以后其尸体又被发现了，（这一情况现在发生的很少），而这些事件算作谋杀。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些被逮捕的人现已发现还在官方的拘留中心，他们算作政治犯。现在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另一些情况下，被捕的人已经获释。最后，还有被捕的人再也无法找到的情况，这个情况现在不多，估计这是因为他们被谋杀了以后尸体被藏起来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算是失踪。特别代表认为，在将逮捕和失踪的人数情况列入其报告之前，有必要先作出这方面的解释，因为逮捕和失踪的人数有时候与被谋杀的人数相重叠。

71. 特别代表首先正在抄录法律保护”所提供的关于1986年内由政府官员执行的逮捕的数字，其中已扣除该来源认为由身份不明者执行的逮捕的数字。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被捕人数	12	15	3	18	45	10
在官方拘留中心发现的被捕人数	11	15	3	15	32	12
起草报告时尚未发现 的被捕人数	1	—		3	13	4

72. 根据主管当局交给特别代表的有关资料，截止1986年9月23日，在Ylopango女犯监狱内监禁的有76名政治犯，与此相比，前一年9月1日的数字为44名，在Mariona男犯监狱里监禁的有972名政治犯，而1985年9月1日的数字为462人。特别代表回顾道，1985年(E/CN.4/1986/

22, 第85段), 政治犯人数比1984年为多。

73. 特别代表将用萨尔瓦多政府提供的其他资料来补充前一段内提供的情况。³⁶ 根据这些资料, 在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5月31日之间, 有1,165人被当作恐怖主义分子被捕(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之间的这一数字为743人), 其中512人获释(1984年9月1日至1985年8月31日之间的这一数字为309人)。

74. 前面各阶段表明, 1986年处于政治原因进行的逮捕的数字比过去几年有所增加。特别代表当然不否认萨尔瓦多当局有权对用武力破坏法律秩序的人采取法律行动。他所关心的只是对被捕的人采用了受到严厉指责的第50号法令的规定, 而这项法令所规定的时限虽长, 还是不能始终得到遵守。但是, 特别代表又指出, 修改这项法令是最近就将进行的法律改革的内容之一, 这一点他将在讨论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的计划时作更加详尽的解释。

C. 政治犯的待遇

75. 在去年的报告中, 特别代表说, 他发现了一些迹象表明有人在对一些政治犯进行司法以外的审讯时采用了相当于惨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严重的心理压力。他还说, 他不相信这是萨尔瓦多的当局的蓄意并且是一贯的政策(E/CN.4/1986/22, 第192段)。

76. 关于1986年, 特别代表收到了关于政治犯待遇的各种不同的资料。

77. 比如, 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会的说法³⁷, 在1986年1月到4月间, 有22人作为政治犯进入Ylopango女犯监狱, 并且根据该办事处所作的研究报告, 还存在着将产生心理影响的酷刑事例, 施加心理压力的事例以及将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酷刑事例, 其中除其他情况外, 还包括5起强奸事件, 21起殴打, 2起被强迫裸体。据这同一来源³⁸, 在1986年1月至4月之间, 有117名

男政治犯进入 Mariona 监狱，这些人在不同的场合下，遭受到了将产生心理影响的酷刑以及将严重影响健康的酷刑。特别代表还从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那里得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根据这一材料，在法外审讯过程中对于政治犯施加酷刑是普遍的和持续不断的做法。

78. 特别代表在他前往 Mariona 和 Ylopango 两监狱查看中以及他于证人的交谈中，特别注意到把法外审讯中采用心理压力甚至其他种类的虐待方式的问题。

79. Tula de Canles 女士也叫作 Laura Pinto, 是母亲委员会的成员，曾两次被保安部队拘留过，她在 Ylopango 曾告诉特别代表，在她 1986 年 5 月 6 日第一次被捕之后，她在审讯过程中将尽 3 天始终被带上手拷并且蒙住眼睛，在这期间，她曾三次被强奸，尽管她怀孕已经六个月了，她的腹部被锋利器具刺伤过。特别代表指出，该证人在其他场合也曾经陈述过同样情况。据特别代表所听到的情况，在她 1986 年 5 月 26 日第二次被捕之后，de Canles 女士、被带到税警总部，在那里她遭受殴打，24 小时没有东西吃，并且被带上手拷和蒙上眼睛。最后，该证人告诉特别代表，她是自愿在证词上签名的，因为证词记录了她所说的话。

80. 在 Ylopango 监狱地采访的另一名证人是 1986 年 5 月 26 日被捕的，他告诉特别代表，她被捕的时候被蒙上眼睛带上手拷，并说她被带到税警总部之后，审讯者曾威胁要将她十八个月的女儿带进来遭受酷行。该证人说，尽管法外证词中有些是真实的，而有些并不真实，她还是签了名。特别代表希望补充指出，她在工作总部看了一个录象，录象内容是，证人在没有任何要挟的情况下签署一项文件。

81. 在 Ylopango 受审讯的另一名政治犯是于 1986 年 8 月 25 日被拘留的，她给特别代表看了她右手腕上面的一个伤疤，据她说是由于在税警总部戴手铐连续 13 天所造成的。这一证人还说，他们对她的待遇“很糟”，因为她否认了

他们的指控。他们不让她呼吸，并猛击她的头部和脸部。她被蒙上眼睛达6天之久，有一次还通宵达旦地审讯她。

82. 特别代表还在MARIONA男犯监狱听取了证词。在这监狱里，有两名证人说，在1985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内他们在受到审讯时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压力。另一名证人说，他1986年6月被第二队的士兵拘留时遭到了这种压力。施加这种压力的目的是要让他签署法外证词，据证人说，施加压力的方式包括猛击他的脚后跟，对其家庭的威胁，以最大音量放出收音机里的节目达5天之久，从而妨碍他睡觉，在寒冷的夜里整夜不让他穿衣服，并且强行喂他吃饭。最后，证人说，他被转到在圣萨尔瓦多的国民警备总部，在那里，他被迫签署了法外证词。

83. 另一位名叫Rafael Martinez的证人是SICAFIE的工会成员，他告诉特别代表，他于1986年5月31日被拘留，即被带到在松索纳特的第6营，在那儿，他受到了性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威胁，并且在为被允许看过文件之前即签署了该项文件。

84. 另一名证人叫Febe Elisabeth Velasquez，也是工会成员，她说，她于1986年6月7日被捕，最初是被带到税警总部，她一直站立着接受审讯，不允许进食或者使用卫生设备，如此24小时以上，最后她还是在胁迫下签了名。

85. 最后，有一对年龄分别为16岁和18岁的姐妹与她们的父亲一起曾经于1986年8月14日受到国家警察的逮捕，她们也说，她们遭受了一些压力，但是她们还是签署了警察给她们的证词。

86. 至此为止，特别代表已经提出了足以证明在对政治犯进行法外审讯中存在着使用心理压力的证据。特别代表所询问的其他一些犯人或者已获释的犯人并没有指控他们曾经受到过任何方式的虐待或压力以迫使他们签署证词。

87. 特别代表对主管公共安全的副部长Lopez Nuilla上校以及保安机构的各负责人，表示他对所提出的证据的关注。特别代表说收到的答复是，证据

纯属捏造，这是旨在诋毁安全机构的造谣运动的一部分，并说为了维护这些机构的声誉，最近几个月内，政治犯在签署其法外证词时都作了录象。特别代表事实上能够看到一些录象，其中有些政治犯（特别代表认识其中一些政治犯但并不认识另一些政治犯）正在没有任何要威的情况下在纸上签名，但纸上内容无法判明。

88. 在审查了上面几段所提出的情况以后，特别代表重申他在前一项报告中表示的看法，就是有迹象表明在对有些政治犯的法外审讯中确实采用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但是他并不相信这是萨尔瓦多当局蓄意和有一贯的政策。

89. 特别代表很难确定这种压力发生的情况的百分比，但他注意到，他在萨尔瓦多所询问的各消息灵通人士给他的数字为大约所有政治犯的15%到20%。美国记者James LeMoynes于1986年8月写道：“相当可靠的政府和外交官员估计，20%的政治犯在被捕以后遭受了某种形式的严重伤害”。

D. 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状况

90. 在这一节里，特别代表将从三个出发点来总结并评价关于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状况的材料：第一，调查和惩治严重违反人权事件的司法行动、第二，调查并惩治涉嫌和武装反对派进行合作的行为的司法行动、第三，最高法院为实行人身保护令和基本自由保护令所采取的行动。

91. 关于为调查和惩治最近该国违反人权的行为所采取的司法行动，特别代表再次收到了共和国司法部长的一项文件⁴⁰，其中除其他内容外还涉及到司法部长办公室对一些案件所进行的工作（即通常称为有“国际影响”的案件）。

92. 比如，在萨尔瓦多司法区第四刑事法庭受理的关于暗杀Oscar Arnulfo Romero主教的事件中，司法部长报告已经于1985年底和1986年初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据司法部长说，并没有取得正面的成果。

93. 司法部长的文件中还提到松索纳特第一刑事法庭在处理“Las Hojas”案件中常用的简单程序，特别代表在以前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这一案件。这项文

件说，关于这一案件，法官经对所有事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以后，同意将案件中3名被告提交全体法庭听讯，而其他被告的案件被撤销。司法部长对这一撤销提出上诉以后，西部刑事法庭撤销对所有被告的审判。1986年5月11日，有人要求重新进行审理程序，展开新的调查。

94. 司法部长文件还提到涉及1981年1月在谢利顿饭店打死了Viera和两名美国顾问的事件的刑事程序，指出，被告今年终于被判处徒刑30年。这一判决受到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的刑事厅还是维持了原判。关于这一事件，特别代表获悉⁴¹，这一判定使一些外交界人士气愤，因为那些幕后策划谋杀的人，即两名军官和一名右派杀人，并没有受到判决。

95. 关于Armenia事件，即在1980—1982年之间在Armenia绑架并就地处决了一些公民的行动，主管法院于1985年11月18日决定撤销对被告的指控。司法部长办公室对这一决定提出了上诉。

96. 特别代表在这一节里将提及最近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审查了在过去7年中16起重大的政治暴力问题司法案件的情况。根据这项报告说，“这真是一连串的挫败。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其中包括1984年8月交杜阿尔特总统的特别委员会的5起案件，都已经得到进行官方调查和审判的保证。但是这些案件以及千千万万数不知名的案件，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

97.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在这些所谓“具有国际影响的程序”中，只有一个案子已经判决交下属机关执行（而且即使在这一案例中，其判决也受到了批评），从而至少表明了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系统非常疲软涣散。特别代表还指出，他没有收到关于在近年来对普通萨尔瓦多公民采取的其他许多严重违反人权案件的材料，并回顾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只挑出一两个事件来，即使国际压力只是施加在其中的一些案件。从法律规则的观点出发，所有的案件都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并且同样地受到法院的审理，这就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98. 如以前的几次情况一样，特别代表得到了萨尔瓦多政府提交的关于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6月30日因对居民犯有罪行而被提交普通法院的军人的材料。⁴³

99. 这些数字如下：

1. 被控犯有抢劫、偷窃和暴力行为的军人.....	3 1
2. 被控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军人.....	2 9
3. 被控犯有杀人罪的军人.....	3 7
4. 被控犯有强奸罪的军人.....	8
5. 被控犯有敲榨勒索罪的军人.....	6
6. 被控犯有其他罪行的军人.....	1 5
共计.....	1 2 6

100. 前一段内所提到的记录是详尽的，特别代表已经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数字。但是，在其研究结束以后，他的印象是，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案例都只涉及普通的罪行，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侵犯人权罪行。而且文件资料从未提及司法程序进行到什么阶段，最后，特别代表也没有听说过这些案件或者其以前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案件是否最终导致判罪或者宣判无罪。

101. 经仔细地斟酌了前面几段中的材料，特别代表仍然认为，总的说来，萨尔瓦多司法机构调查并惩治严重的、出于政治动机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工作还远远不令人满意。尽管在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案件中确实进行了刑事司法程序，但他的印象仍然是，这些程序的发展极其缓慢，并且在判罪中似乎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对惩处犯罪造成了有害的气氛。

102. 特别代表现在将萨尔瓦多主管调查和惩处与武装反对派合作的行为的刑事法院的活动这一方面的材料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法律程序依然是受到第50号法令的指导，这项法令是1984年2月29日由立法大会所颁布的，其中

包括一项关于宪法保障受到终止以后应当采取的刑法程序的法令。

103. 特别代表在以前的一项报告中 (E/CN. 4/1985/18, 第81-85段) 报告了法令的内容及其受到的批评。 对法令的批评还在继续, 特别代表在此将个别提出 Jose Simeon Canas 中美洲大学的人权研究会提出的批评, 以及要指出共和国对国际人权所负有的责任, “ 并提到基督教法律援助会的报告中 ” 所提出的要求该办事处向最高法院提出声明, 宣布该法令不合宪法的行动。 不管怎样应当指出, 根据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主席在萨尔瓦多市向特别代表提出的解释该委员会的直接计划之一是要修改或者取代上述第50号法令。

104.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提供的材料, 1985年对128名政治犯撤销起诉, 而在1986年的最初八个月内, 也就是截至8月31日, 则有110人。 这表明对这种起诉的重新审理在1986年的最初几个月内比前一年要多, 但是特别代表所听到的证词表明, 第50号法令中原已相当长的时限依然常常被忽视。 事实上, 当特别代表于去年9月前往萨尔瓦多的监狱时, 他发现一名囚犯已经遭受审讯前拘留长达两年。

105. 前面一段所提到的程序受到了第一初审军事法院的裁决, 这是1986年9月1日前仅有的一次。 特别代表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 审理这么多的政治犯只派一名法官是不够的, 在本报告中他指出, 根据立法大会1986年8月19日第435号法令, 并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倡议, 又建立了两个新的初审军事法庭。 这些新法庭的法官于1986年9月1日开始任职。 特别代表能够在萨尔瓦多市采访这些法官, 他希望这一类的程序将因此会较快地得到审理。

106. 关于最高法院审理有关人身保护令的活动, 并且根据该法院院长在萨尔瓦多市给特别代表的一些文件, “ 在1985年9月和1986年8月之间, 已收到了586份申请; 63人在法院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获释; 84人因法院的决定获释; 62人失踪 (可能是因为他们已加入游击队运动或者已前往美国, 此为最高法院院长向特别代表所作的解释); 131人被押回监狱; 对16个人来说, 其

申请被裁决为没有根据，因为其活动事实上并没有受到限制。

107. 如以前几年一样，特别代表从主管当局处得知萨尔瓦多刑事司法正常运行中的困难。 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如下：(a) 发给法官和检查官的足够薪水所需要的预算数额太小，特别是初级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及法庭、法院和司法部长办公室各办事处所需的足够的资源；(b) 在调查事实中没有适当的手段；(c) 对法官采取的心理压力，其中许多人在最初阶段被谋杀或者受威胁；(d) 证人惧怕在诉讼中对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提出证词；(e) 陪审员惧怕参与这类诉讼；(f) 刑事立法和刑事程序不适于目前的暴力气氛；(g) 在有冲突的地区法院和司法档案受到破坏。 主管当局并指出，这些情况并不是完全新出现的，也不是萨尔瓦多独有的，而只是在近年来由于内战和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尖锐严重而已。

F. 游击队侵犯公民和政治权利事件

108.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关于据说是游击队对平民非战斗人员进行政治性谋杀的情报。 很明显，在评价据说是国家机构和极右翼准军事组织成员所进行谋杀的情报时建议持审慎态度，对于据说是游击队所进行的谋杀也必须采取这一态度。

109. 法律保护组织⁴⁸ 提供的数字如下：

一月	2
二月	1
三月	2
四月	—
五月	2
六月	2

110.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⁴⁹ 所提供的数字要大得多：

1985年	九月	9
	十月	26
	十一月	11
	十二月	24
1986年	一月	25
	二月	24
	三月	20
	四月	21
	五月	31
	六月	22
	七月	18
总 计		231

111.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数字⁵⁰ 略高于以上数字。根据这一情报, 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由武装部队所清点的谋杀平民数字达259人。

112. 特别代表指出, 根据法律保护组织的数字, 游击队在1986年前6个月中的谋杀数字(9)大大低于1985年头6个月(31)。在另一方面, 根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的数字, 游击队在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间谋杀的数字(231)高于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期间(172)。

113. 根据特别代表所得到的解释, 游击队的谋杀对象是被怀疑向武装部队提供情报的人或正在度假的士兵。

114. 据说游击队还进行政治性的劫持。法律保护组织⁵¹ 所提供的数字如下:

一月	3
二月	0
三月	3
四月	1
五月	0
六月	0

115. 据称马蒂民解阵线在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劫持平民的人数要高得多⁹⁰，根据这一说法，在此期间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劫持了357人，包括10位市长。这一情报还说，有些市长的下落至今不明。

116. 特别代表在上一份报告(E/CN.4/1986/22, 第135段)中报告了Omar Napoleon Avalos上校被马蒂民解阵线劫持。尽管马蒂民解阵线当时宣称该上校是作为战俘被关押的，而且受到了符合各项日内瓦公约的人道待遇，但特别代表了解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未曾获准探望该上校，圣萨尔瓦多大主教Rivera y Damas仅能探望该上校一次。

117. 特别代表收到了关于马蒂民解阵线下令“中止”交通的情报。这种交通中断包括禁止车辆在某些特定时间在某些特定地区行驶。这一禁制影响了公共运输和私人车辆，而马蒂民解阵线试图用暴力手段来执行这一禁令，导致了用机枪扫射和焚毁车辆。据某些人士说甚至还造成了伤亡。这种交通中断还损害了经济。

118. 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所提供的情报，⁹⁰ 1986年9月至1986年8月间发生了282起交通中断。特别代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了许多关于交通中断和由此引起的死亡、受伤和经济损失的新闻报道。

119.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根据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向特别代表提供了有关交通中断的下述情报：1986年由游击队造成的交通禁制：1月16日至22日；

1月31日至2月7日；3月10日至16日；5月12日至17日；6月20日至27日和8月24日至31日。袭击公共汽车，焚烧（3）；机枪扫射（5）；爆炸（1）。焚毁其他车辆（17）。这些事件导致人员受伤：16人以上。（据某篇文章分析，“一些”人受伤，但未提供具体数字。）

五、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情况

120. 特别代表一如前几份报告中所做的那样，建议在本章中提供关于许多被迫离开家园的萨尔瓦多公民情况的情报，这些公民或是为了移居该国的其他地区（流离失所者），或是在其他国家谋求庇护（难民）。特别代表认为，目前遍及萨尔瓦多的暴力是这种大规模出走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是因为，出国在萨尔瓦多一直是一个因经济原因而引起的惯常现象。

121. 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同内政部长讨论了在国内流离失所的萨尔瓦多公民的情况，这些萨尔瓦多公民依赖全国救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的服务。根据官员们口头和书面提供的情报，截至1986年8月为止，萨尔瓦多共有4,200,000流离失所者。⁵² 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报告以及特别代表同内政部长和内政部副部长之间的谈话都表明，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的服务正在采取一个新的方向：⁵³ 过去实行“包管”的做法，仅是由流离失所者从政府得到粮食配给，现已不再这么做，而是采取了“以工换粮”的新政策，以便把流离失所者逐步重新融合进社会和生产性生活。这一计划称为流离失所者全国计划，目前正处于初步执行的阶段。作为这一方案的一部分，选定了约50个村镇，让流离失所者在同他们原来的家园相近的社区重新安置。在每一个村镇将实行包括500个家庭或总共达2,500人的流离失所者重新安置计划；50个这样的计划将解决25,000个家庭或125,000人。计划中进行的有创办或扩大医疗和教育服务，妇女同社区发展相结合以及改善就业机会。

122 在1986年的头六个月中，政府向244,536名流离失所者提供了粮食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在这一时期，平均每月为改善这部分人口的饮食而花费249,536科郎；建造了338个临时住所；分发了5,289条毯子，4,231套儿童服装和1,010条肥皂。此外，萨尔瓦多政府借助外来援助，在全国设立了506个流离失所者当地委员会来促进和训练各个流离失所者组织的领导人，并同另一个组织合作”设立了流离失所者人力培训方案。这些方案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得到了300,000美元，并从全国援救流离失所者委员会的经常预算中得到了100,000科郎，在这些方案下为总计为208名领导人举办了五次研讨会，并为200名工人开办了第一次人力培训讲习班，每个工人都将受训五个月。在同圣萨尔瓦多市政厅的协调下，在六个当地社区为文盲流离失所者总计115人开办了扫盲班。世界粮食规划署所提供的资金使得60个流离失所的家庭返回了原居地，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一个类似项目下所提供的财政援助也帮助了另外587个家庭。

123 政府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四个在原居地重新安置300个家庭的项目，要求其提供资金。”

124 特别代表今年再次报告，从战斗地区流落出来的某些萨尔瓦多人是由当局强行迁出的。在这方面，特别代表收到了由武装部队于1986年1月9日在圣萨尔瓦多以北17英里左右的Guazapa火山地区发动“凤凰行动”的情报。据《泰晤士报》报导，”萨尔瓦多军队在Guazapa火山地区逮捕了近1,000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并把他们转移到靠近Apopa城一个叫作Calle Real的难民营。但另有消息来源说，”从战斗地区撤出的平民仅为500人左右。这些平民“转移到离开战事数英里的一个安全地区，并得到了粮食、水、住房和衣物。他们还得到了药品，并受到医生、牙医、社会工作者和国际红十字会及人权委员会代表的照料。这些平民中大部分人已经很快安置在亲友处，或安置在流离失所者营地”。根据同一消息来源，国际新闻界的成员可以采访从Guazapa行动中撤出的平民，“并没有收到任何可信的虐待指控”。”

125. 美洲监测组织也详尽地报导了这次撤离，并作了很多批评。据该组织称“凤凰行动中撤走平民的方式没有达到国际法关于向被迫放弃家园的人们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的要求”。美洲监测组织还声称，这次撤离没有达到《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17条规定的标准。”

126. 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17条，特别代表认为，强制平民从战斗地区撤走，这在为保证有关平民的安全而必须如此的时候是许可的。他还指出，面对战争的现实，平民居民因这种撤离而遭受的痛苦轻于继续居住在战斗地区而受到的苦难（E/CN.4/1986/22，第142段）。特别代表重申他在这方面的信念，并指出，萨尔瓦多教会至少一名高级成员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1986年2月25日的一次布道会上，代替生病的Rivera y Damas传教的Jesus Delgado说：“在Garrizal，教会的一些非神职人员，其中大多属法律保护组织，去同那些人谈话表示教会愿意提供帮助。他们想把那些人带到教会的房舍，但这些人已得到了游击队中政治领导人的指示，要他们不要离开那里，而是施加压力要政府把他们送回家园，不让别人夺走他们的土地。我认为这完全是顽固不化：教会向他们伸出手来，这看来是一个很公平、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人要夺走他们的土地，军队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全面的作战，以一劳永逸地扫清Guazapa地区，把这些人送回那里这是一种罪行”。⁶⁰

127. 因此，特别代表尽管完全意识到强制撤离措施会给所涉人员造成很大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但他还是认为，在为平民居民的安全起见而需要强制撤离的情况下，强制撤离还是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所许可的。1986年9月，特别代表访问了Zacatecoluca附近一个由84个农民组成的社区，有机会直接考查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农民是1986年8月16日从圣维森特省San Carlos Lempa区由陆军工程兵团撤出的，并监管在Zacatecoluca。这些农民确实得到足够的粮食配给，在极端的紧急情况下也得到了医疗救助，另外还有一位陆军社会工作者替他们服务，但是他们所住的地方——一些旧马棚——也确实由于过份拥挤、缺

水和无法扑灭蚊虫而极不卫生。此外，这些农民没有床，甚至也没有垫席。特别代表是在一个星期四看望这些农民的。工程兵团团长向特别代表解释说，从下一个星期日起，有亲属招领的人可以获准离开。某些没有亲属的农民十分担忧今后的命运。特别代表最后指出，所有同他谈过话的农民都一致希望能够有土地耕种，而不论是哪里的土地。

128. 关于难民，国防和公共安全部的报告⁶¹说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确认的萨尔瓦多难民总数为42007人，散居在下列国家：

墨西哥	3 475
危地马拉	105
伯利兹	3 000
洪都拉斯	20 868
尼加拉瓜	7 735
哥斯达黎加	6 000
巴拿马	824

129.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⁶²报告说，截至1986年7月31日，接受难民署援助的萨尔瓦多难民分为以下数群：伯利兹2,600；哥斯达黎加3,750；洪都拉斯（Mesa Grande, Colomoncagua和San Antonio等营地）20,900；墨西哥3,500；尼加拉瓜2,300；巴拿马800。

130. 至于萨尔瓦多难民的遣返问题，外交部长里卡多·阿赛维多·佩拉尔塔于1986年9月22日在萨尔瓦多同特别代表会谈时通报说，在1986年成立了洪都拉斯境内萨尔瓦多人自愿遣返三方委员会。委员会由萨尔瓦多政府代表、洪都拉斯政府代表和难民署中美洲、巴拿马和加勒比区域代表组成。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处理有关身在洪都拉斯而愿意返回萨尔瓦多的那些萨尔瓦多人的问题。遣

返这些难民的工作⁶³从难民署洪都拉斯办事处开始，该办事处通知难民署萨尔瓦多办事处萨尔瓦多人抵达边境的情况，全国救助流离失所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边境迎接这些萨尔瓦多人，向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医疗服务、服装和基本家用品。然后由遣返者表明愿意重新安设于何处。如果遣返者有亲属可以共同生活，则前往亲属处。如果没有亲属，则重新安置于圣米格尔省 MONCAGUA 的 HACIENDA LA REFORMA 或莫拉桑省的 SANTA BARBARA 定居点。

131. 据难民署官员称，“1986年1月1日至7月31日间，难民署协助从洪都拉斯遣返了814名萨尔瓦多难民，使1984年以来从洪都拉斯遣返的难民总数达到3751人。在同一时期内难民署协助从尼加拉瓜遣返了156名难民，使1984年以来从尼加拉瓜遣返的难民总数达到751人。

132. 还应该指出的是，难民署正在同萨尔瓦多政府合作，援助目前在萨尔瓦多境内的约200名原籍为尼加拉瓜的难民。

六．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133. 特别代表希望如上一份报告 (E/CN.4/1986/22) 一样，对双方——正规军和游击队——在萨尔瓦多共和国武装冲突期间或由于武装冲突而据称侵犯人权的资料加以特别注意。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指出，萨尔瓦多是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由于萨尔瓦多境内的冲突是这些《公约》和《议定书》所指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因此，有关各项规则应该适用，特别是各项《公约》和《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3条所载的各项规则应该适用，而冲突各方——萨尔瓦多正规部队和反对派游击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134. 特别代表将首先处理据称是萨尔瓦多正规军的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非作战人员或平民伤亡的资料。他将提供他所听闻的伤亡数字，但他要强调，处理这些数字时必须特别谨慎。它们实际上是作战地区的死亡人数，在作战地区进

行调查格外危险，进入这些地区也有困难。此外，由于战斗牵涉到游击队，因此，有时难以确定伤亡人员是否作战人员。1984年中期以来大主教管区法律保护处使用的区分方法就说明了这些困难。这种方法区分三种伤亡情况：(a) “军队对人民滥以袭击的受害者”；(b) “军事行动中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包括作战人员和平民——由于在现场无法确定身份，因此不能划定适当的类别，但推测他们大多数是平民” (c) “伏击、冲突或巡逻中被杀害的政治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在现场无法确定身份，因此不能划定适当类别，但推测他们大多数是作战人员”。由此可见，推测在这一方法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必须慎重地考虑到这一情况。

135. 根据法律保护处，“军队对平民滥以袭击的受害者人数（未加推测）如下：

1月	5
2月	0
3月	1
4月	2
5月	无资料
6月	5

136. 根据同一来源，“被军队设置的地雷意外杀害的平民人数如下：

1月	0
2月	1
3月	0
4月	2
5月	无资料
6月	无资料

137. 特别代表注意到，虽然1986年头四个月的报告将平民的死亡归因于军

队埋设的地雷，但从5月（第49号公报）和6月（第50号公报）起，法律保护处并没有说明谁埋设的地雷造成了死亡。

138. 法律保护处还认为，“1986年，‘军事行动中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包括作战人员和平民——由于在现场无法确定身份，因此不能划定适当的类别，但推测他们大多数是平民’的人数为：

1月	110
2月	81
3月	56
4月	116
5月	67
6月	59

139. 但是，特别代表不得不指出，上一段所载的部分数字是作战人员人数，而大多数人是平民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如有关来源的明确表示那样。

140.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提供的1986年“由于军队和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之间冲突而被杀害的平民”“人数如下：

1月	0
2月	3
3月	0
4月	2
5月	3
6月	0
7月	2

141. 但是，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⁶⁷根据新闻报导提供的在军事行动中被杀害的平民人数如下：

1月	0
2月	2
3月	2
4月	2
5月	1

142. 在确定政治暴力的平民受害者人数时必须推测，显然是由萨尔瓦多境内的冲突性质所决定的。这场战争是正规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战争，要区别平民和正规军的成员往往比较容易，但要区分非战斗人员和游击队战士则比较困难，如果非战斗人员是所谓的“masas”成员就尤其如此。

143. 特别代表在其1984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A/39/636 附件，第122段）中提到了所谓的masas 即农民团体。尽管他们实际上并非作战人员，但却与游击队同生活并向游击队提供生活物资。特别代表要重申他当时的意见：“既然所谓的masas 没有参加战斗，就必须将他们看作是平民”；他还指出：“按照1977年对《1949年8月12日内瓦第三项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第50条规定，跟随武装部队但并非武装部队组成部分的任何人，如给养供应人员以及负责部队福利的工作部门或服务部门的成员，必须被看作是平民。特别代表认为，如果陪同游击队的masas 符合这些国际文书所规定的条件，就不能将他们作为作战人员：他们是平民”。

144. 这是特别代表在1984年表示的意见，他现在再予重申。然而，可以想象通常属于masas 的人员，可能临时或在特殊情况下参加与其平民身分不相符合的行动。特别代表于1986年9月在萨卡特科卢卡同若干masas 的成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以后，认为这种情况在萨尔瓦多是颇为普遍的。一名十八岁的女孩告诉特别代表说，她和其他一个人除了“同游击队员睡觉”之外，还向游击队员提供粮食并帮助他们运送弹药。特别代表认为，由于从事运送弹药的活动，这

些 masas 就不再具有平民的身分。

145. 因此，虽然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在原则上是很容易并且很明确的，但就萨尔瓦多的冲突以及有游击队参与的情况而言，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之间真正的分界线有时可能很模糊。这并不是说特别代表认为袭击 masas 的行动是正当的，而是说对萨尔瓦多正规军的战争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进行统计和分类时，很难确定某人是作战人员还是非作战人员，因此必须推测。

146. 无论如何，所谓的 masas 即使在特殊或临时情况下才积极参与同正规军的战斗，但实际上这会导致他们受到骚扰，并甚至导致平民有时死于军队手中，其财产遭到意外破坏。

147. 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曾听取了上述一类受害者的若干证词。这些证词使他作出推断，认为死亡的平民一般都是在游击队作战地点周围的 masas。

148. 例如，一名 55 岁的目击者是特南辛戈人，他失去了一条小腿。他说，1986 年 7 月 23 日，他在游击队作战地点附近的某一地区，当时有一架空军直升飞机发射一枚火箭，击中了他的小腿。这位目击者说，他和该地区的其他居民都支持游击队，他们有时向游击队供应物品。

149. 另一名 24 岁的目击者是卡瓦尼亚斯省圣佛朗西斯科人，现在居住在某一地区。他说，1986 年 6 月 1 日，他观看了军队在该地区同游击队作战。据这位目击者说，正规军在作战中毁坏了玉米田，空军飞机扔下了炸弹，炸死两名妇女并炸伤一名 8 岁和一名 12 岁的儿童。这位目击者说，作战时游击队正在该地区，当地居民都向游击队出售粮食，协助他们。

150. 另一名 20 岁的目击者是圣萨尔瓦多省某一地区的居民。他说，1986 年 1 月 1 日，军队对该地的游击队攻击。陆军、空军和伞兵部队毁坏了该地区的所有房屋，并烧毁了庄稼。

151. 特别代表根据迄今收集到的资料得出了结论，认为萨尔瓦多军队陆军和空军对私人财产造成了意外破坏，并有时造成平民的死亡，主要是造成所谓的 masas 的死亡，不过数目很低，显然比前一年要低。特别代表还指出，与1981年、1982年、1983年和1984年不同的是，他在1986年没有收到说明萨尔瓦多军队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可靠资料。

152. 虽然在圣萨尔瓦多盘问的一位目击者实际上描述了一场大屠杀的严重事例，但特别代表认为他的证词至少可以说是完全难以相信的。苏奇托托省某地区一名40岁的目击者说，1986年某一天——他记不得确切的日期——他看见空军向圣文森特的平民投掷炸弹，陆军用大砍刀向他们袭击，有150人被屠杀。鉴于这一证词十分严重，特别代表询问目击者他是否点过尸体。目击者作了肯定的答复，并说他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埋葬了尸体。特别代表在同一天要求目击者陪他到发生事件的现场，以便在必要的协助下掘出尸体进行清点。这时，该名目击者却改变了说法，说尸体实际上被扔进附近的河流（“他们就把尸体投入河中”），由于河水已将尸体冲走，很难再找到尸体。特别代表注意到这名证人改变了说法，并进一步认为，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当地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以及通讯媒介定会对此场所谓的大屠杀详加报导。

153. 特别代表认为，被萨尔瓦多军队杀害的平民人数剧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平民撤出了战斗区。特别代表在讨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情况时已经指出，根据他的看法，并从原则上来说，这种撤出平民的做法是正当的，尽管这些做法继续给萨尔瓦多当局造成各种问题。

154. 按照布兰东将军（参谋长）和布斯蒂略将军（空军司令员）在圣萨尔瓦多对特别代表所作的解释，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游击队采取了新的战术。马蒂民解阵线最初作战时以中型和大型部队为单位，但后来萨尔瓦多军队采取反暴乱战略，迫使游击队部署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单位，因此他们无法再同 Masas 一起活动。这样就可以袭击游击队而不致对平民有任何威胁。

155. 由于上述原因，并按照萨尔瓦多总统1984年8月的指示，“萨尔瓦多正规军现在正来用比过去更加人道主义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并能够大大减少平民死亡人数。

156. 关于萨尔瓦多军队进行战争的方式，特别代表收到了有关萨尔瓦多军队拆除马蒂民解阵线战地医院的若干报告。1986年1月至2月在瓜萨巴地区进行“凤凰行动”期间，萨尔瓦多军队拆除了18个保健站；“3月12日和13日，在查拉特南戈省阿卡塔奥和努埃韦特立尼达摧毁了一家医院和另一家保健站；”7月在辛特拉又拆除了一家医院（A/39/636/，附件，第125段）。

157. 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同国防部长和其他军事当局人士交谈时，提到了马蒂民解阵线医院被拆除一事。三军参谋长布兰东将军回答说，这些所谓的医院迄今都没有任何可以辨别的标记，它们只不过是马蒂民解阵线的几个巢穴或洞穴，用来整理通常是偷盗而得的药品，并用以掩蔽伤员，使他们处于非人之境。由于缺乏医疗照顾，许多人因此死亡。布兰东将军还说，如果军队在这些洞穴中发现任何伤员，便将他们转移到军队自己的医院，以便他们得到适当的照顾。实际上，萨尔瓦多政府通知特别代表说，“1986年4月4日，军队从查拉特南戈省阿卡塔奥以北一个巢穴救出的7名游击队伤员已获释，并被转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代表”。特别代表获悉“这些伤员是在1986年3月13日被发现的，他们被转移到首都的一家医院，并一直留在医院内，直到被转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为止”。发给特别代表的电传提供了获释的游击队员姓名。电传最后指出：“交出游击队员并没有以任何交换为条件，而是使这场冲突人道主义化的努力的一部分，以求实现和平”。《美洲观察》也报告了这些事件，⁷²并形容这一行动是“令人鼓舞的发展”。

158. 由于在战争中使用地雷,许多平民已丧生或由于失去肢体而受重伤;特别代表对此特别关注。

159. 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⁷³ 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8月31日之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埋的地雷使96个平民丧生,1167名平民残废(失去腿、眼或脚)。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正在进行一项研究;⁷⁴ 该项研究表明,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7月31日之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埋的爆炸装置使68位平民丧生,208位平民受伤。特别代表指出,该研究报告非常详细,载有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并指出了爆炸的时间和地点。

160. 但是,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革命民主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提供给特别代表的报告却⁷⁵指出“政府军正加紧滥用地雷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地雷都是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设置的,并造成平民伤亡,企图使使用地雷合法化或至少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非战斗者中孤立。最重要的是,鉴于地雷是政府军最害怕也是造成政府军最大伤亡的武器,因此军队要抵毁革命运动设置的地雷,因为军队希望革命运动停止使用地雷。”根据该报告,军队以三种方式滥用地雷:(a) 不取出已经设置的地雷引爆装置;(b) 重新设置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设置的地雷;和(c) 在居民区战略要点设置地雷。

161. 特别代表向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Blandon将军提出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这些指责。将军的回答是,政府军使用地雷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指挥所并且只在晚上使用;拆除游击队所设地雷引爆装置的特种部队很少,这些部队当然不能够完成所要求的所有任务(每天只能解除90个地雷的引爆装置);所谓重新设置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地雷只会使政府军自己的士兵受到重大威胁。

162. 特别代表对游击队所设地雷造成的致命和致残后果毫不怀疑,因为他在圣

萨尔瓦多军事医院看到几十名由于遭到这些地雷的埋伏而失去脚、腿或臂膀或失明的士兵。必须确定的是，非战斗人员中类似的死亡或伤残是由游击队地雷造成的，还是由正规军设置的装置造成的。特别代表所询问的肢体已经伤残的平民坚持说，使他们伤残的地雷是游击队设置的。萨尔瓦多新闻界也持同样意见。⁷⁶此外，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所遇到的看来立场超然的人士的普遍观点是，使非战斗人员丧生或受伤的绝大多数地雷都是游击队设置的。记者James Lemoyne 1986年8月写道⁷⁷：“虽然政府军和左派游击队都使用地雷，但是根据若干村民和主管人权官员提供的资料，多数平民伤亡是由游击队地雷造成的。”特别代表也持这种观点。

163. 最后，特别代表指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继续实行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战斗中俘虏的正规军士兵这一人道主义做法。1986年2月25日1名下士和4名士兵，4月9日另外2名士兵以及5月15日一名中士和一名士兵都交给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有一次，一个被俘虏的士兵被当着当地教士和居民的面直接交给了他母亲。⁷⁸特别代表赞扬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这一做法；不过，他仍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尚未获准探访1985年10月26日被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部队俘虏的Omar Napoleon Avalos上校（E/CN.4/1986/22，第135段）感到遗憾。

七、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切

164. 特别代表在他以前提出的报告中指出，他认为萨尔瓦多共和国立宪当局真诚地关切对人权的尊重，这一关切是该国民主正常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正在逐渐产生可喜的成果。特别代表在1986年9月最后一次访问该国时发现萨尔瓦多当局仍然坚定地致力于这一政策。特别代表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当局代表包括共和国总统的谈话再次加强了这一信念，即在建立多元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尊重人权在萨尔瓦多共和国目前政策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65. 特别代表在以前向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中谈到 Duarte 先生 1984 年 6 月作为共和国立宪总统就职后萨尔瓦多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特别代表现在要叙述 1986 年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事实上继续、发展和扩大了以前采取的措施。

166. 主管当局告诉特别代表说, PON(武装部队成员进行逮捕的正常行动程序)和其他补充条例仍然在武装部队和保安机构各单位实施。这些条例的目的是为求确保武装部队和保安机构成员在行使职责时尊重人权。

167. 此外, 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成员继续参加必修的人权课程。根据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 “分配到“人权项目”工作的 16 名神父向整个武装部队的 40,200 名官兵即 80% 的士兵进行了 554 场讲话。同一资料来源还指出, 5 个专业分级班的 225 军官员参加了道德和人权课程。在 14 个提级课程中向 560 名下士和中士提供了类似的教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也增加了人道主义法律和人权的讲话。

168. 教育部在执行《宪法》第六十条时继续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部门教授人权。教育部长告诉特别代表说“具体地说, 教育部在各基本培训中心加强了道德和文明价值以及人权方案”。

169.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1986 年继续开展工作。因此, 根据在萨尔瓦多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文件, “1985 年 9 月 1 日至 1986 年 8 月 31 日之间所开展的工作如下: 收到并处理了 3,491 项指控; 3,907 人已登记被拘留在各军事单位; 委员会代表会见了其中的 2,264 人; 向 911 名被拘留的人提供了援助(衣服和基本必需品); 922 名囚犯在释放时得到接待; 探访安全机构 596 次, 探访军事哨所、市监狱和其他军事机关 2,488 次, 探访刑事机构 907 次; 探访军事法庭和普通法院 355 次, 以便获得有关指控的资料; 探访各城镇 524 次, 以核实各项指控; 委员会医生探访刑事机构 95 次, 对政治犯进行了 818 次

体检，并探访各援助中心26次。委员会还努力促进萨尔瓦多生活各部门的人权（军事卫戍部队、安全机构、民防、地方军队司令部、狱警、教育中心、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心以及国营和私营机构）。特别代表指出，委员会还进行了一次向地雷爆炸受害者特别是农村地区儿童捐献义肢的运动。

170. 在圣萨尔瓦多，特别代表曾有机会研究一些根据上一段提到的各项指控汇编的档案。例如，第1415/1986号档案涉及的是一群士兵强奸一名16岁的女孩的指控。委员会已成功地使被指控的罪犯接受法院的处置。

171. 因此，特别代表再次感到在整个局势下，委员会的活动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些活动往往使在萨尔瓦多战争中遭受痛苦的人减轻了苦难。

172. 与1985年一样，政府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在萨尔瓦多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特别代表再次赞扬该组织的工作。

173. 萨尔瓦多宪政当局关心人权的另一重要证明是所谓司法改革项目，去年的报告（A/CN.4/1986/22，第182—187段）提供了这一项目的广泛资料，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即该项目有4个部分：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司法保护单位；刑事调查委员会；和司法行政与培训单位。

174. 关于该项目的第一部分，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主席Criollo先生告诉特别代表说，委员会24名律师正在三个领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即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和体制／行政立法。Criollo先生说，刑事立法领域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预计11月份可以完成有关修订《第50号法令》的法案的工作，此外还在努力修订《刑事诉讼法典》。在民事立法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修订亲属法；而在体制／行政立法方面，委员会的重点放在若干问题上，其中包括保护、人身保护权和违宪的申诉程序。

175. 特别代表还在圣萨尔瓦多了解到了关于刑事调查委员会的广泛资料；他曾前往该委员会的办事处。该委员会由司法部长、内政部副部长和共和国总统任命

的一名官员组成。⁸¹ 该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包括一个调查组和一个法医组，这两个机构是一个特别小组的一部分，该特别小组帮助安全机关解决了下述案件：“Zona Rosa”的许多杀人案；非法拐卖未成年者案；和总统的女儿绑架案。1986年正在调查下述案件：Sheraton Hotel的三人命案；Los Mongos地区的许多杀人案和Armenia的其他杀人案；谋杀FINATA前主席的案件；谋杀Ana Delmy Belancourt Ramos女士的案件；刺杀Monsignor Romero的案件；和谋杀工会活动分子Aristides Mendez的案件。

176. 特别代表重申他的观点，即司法改革项目是一个严肃的项目，并指出其各部分所取得的进展，但是他再次指出，萨尔瓦多社会只有在中期和长期时间内才能感到该项目的效果，因为归根结底，公民态度和习惯也必须改变，而这些改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

177. 萨尔瓦多政府关心改进人权状况的另一证明是它对希望再次成为守法公民的游击队队员的处理。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⁸² 政府为希望加入国民生活的武装叛乱分子制定了一个特别计划。放弃颠覆活动并上缴武器的人可以得到多达1000科朗（200美元）的经济援助；经过谈话后，他们得到赦免并回到自己的社区重新开始家庭生活。特别代表还了解，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767人得益于这一计划。

178. 最后，特别代表认为，萨尔瓦多共和国宪政当局坚持将努力改进人权状况作为萨尔瓦多政治正常化的一部分。必须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战斗以外和战斗中或由于战斗的结果，在尊重平民生活这一关键领域日益体现出这些努力。显然，特别代表希望这些努力不久将能消除该国所有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象。

八、 结论

179. 特别代表对本报告所载的丰富资料加以慎重和切实的评价以后，现在可以作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如过去一样，只反映他个人的看法。但是应当重申：由于他的职权范围和调查的性质和情况，这些结论并不涉及个别的行为或事件，而涉及1986年期间萨尔瓦多境内的一般人权情况。之所以如此，也是由于特别代表收到浩瀚的关于违犯人权情事的资料，他无法进行必要的调查，以确定他获悉的许多个案中每一个案的真正事实。特别代表的意思是，他对1986年萨尔瓦多境内所发生的违犯人权情事的调查和评价工作绝对不能与一个法庭的工作混为一谈。因此，本报告既没有法律判决的性质，也没有法律判决的重大意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特别代表愿意作出下面的结论。

180.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代表指出，在1986年，萨尔瓦多公民的生活条件出现进一步和令人不安的恶化，基本上由于冲突的持续和世界经济危机而致。特别代表又注意到，强迫平民疏散虽然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原则，但其后却产生难以应付的人和社会问题。特别代表再一次促请注意，马蒂民解阵线对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进行有系统的攻击，严重地威胁萨尔瓦多公民目前和未来对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享受。

181. 关于由军队公安部队和民防成员进行的同战斗无关的政治暗杀，特别代表认为在1986年这种暗杀继续在进行。虽然很难确定其数目，他肯定这个数目比1985年低得多，这证实暗杀行动确实于1984年6月杜阿尔特先生当选共和国总统后开始。其中一些暗杀据说是暗杀队的行为，而暗杀队则涉嫌是同军队或公安部队的成员有关或被他们纵容的。特别代表认为很难证实这些暗杀实际上是暗杀队干的，虽然他的印象是，如果这些暗杀队真的存在和活动的話，它们现在不可能同高阶層軍方人員有联系。

182. 游击部队方面继续当场处决和诱拐平民的习惯做法，但是特别代表没有听

到过出现象去年发生的那些集体屠杀事件。

183. 特别代表又提到政府犯人数目有所增加，一些这类犯人曾经受到严厉的心理压力，但是这并不代表萨尔瓦多当局的一种有系统的做法。特别代表又指出，这类犯人受到载于第50号法令内的那些广泛受批评的法律的支配，而他注意到萨尔瓦多宪法当局打算修正该项法律。

184. 关于萨尔瓦多的刑事司法制度，特别代表提到调查和惩罚前几年许多严重违法事件的犯罪者的活动的进展继续令人非常不满意，而调查和惩罚那涉嫌同武装反对派勾结者的司法程序虽然最近稍为恢复，但却继续被很多人批评的立法，即第50号法令所支配，而其中规定的长程序时限甚至不经常获得遵守。虽然如此，特别代表注意到妨碍刑事司法制度正常作业的种种困难和已经在进行重要、有价值 and 值得称赞的改革法律制度的种种尝试，但它们对萨尔瓦多的情况尚未产生重要的影响。

185. 关于武装冲突，特别代表注意到，今年象1985年一样，但是和往年不一样，他没有收到关于萨尔瓦多正规军进行大屠杀的可靠资料。但是，特别代表确信，在1986年，正规军对私有财产造成了偶然性的损害，并对平民，特别是对所谓的“群众”造成了一些意外的死伤，虽然受害者为数很少，而且肯定比以往几年为低。特别代表还注意到，非战斗人员因触雷爆炸而死亡或受到重伤的数目很大，这是令人不安的，他愿意把以下情况载入记录，即一般的看法认为大部分这种地雷是马蒂民解阵线游击队安置的，他同意这种看法。

186. 还应该指出，游击部队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释放了战斗中俘虏的士兵。

187. 最后，特别代表注意到，尊重人权继续是杜阿尔特总统符合宪法的政府当前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因素，这项政策在民主正常化的过程中，在不论是非战斗情况还是战斗情况或因战斗造成的情况下都尊重人的生命这个关键领域里，正取得越来越重大和值得赞扬的结果。

九 建议

188. 再次忆及萨尔瓦多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尊重人权所表示的关切，并特别考虑到生命权利的根本性质以及对这项权利的侵犯将是不可逆转的这项事实，特别代表首先并且最着重地建议，有关各方应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彻底消除不论是在非战斗情况还是在战斗情况或因战斗造成的情况下，企图夺去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身体完整和自由的做法。应该以完全符合《1949年日内瓦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国内生效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189. 特别代表认识到进行对话的困难，并附和国际社会的看法和他相信是绝大多数萨尔瓦多公民的观点和愿望，他再次建议萨尔瓦多政府和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迅速恢复会谈。这样的会谈应该是公开和宽宏大量的，而不仅仅是战术性的，至少应该以使冲突人道主义化为目标，以期可以取得谈判的解决办法，挽救萨尔瓦多共和国许多公民，不论他们是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的生命。

190. 特别代表特别向萨尔瓦多共和国符合宪法的当局建议：

(a) 迅速废除同在萨尔瓦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标准不符合的法律，并通过与这些标准相符的规范，特别是关于检举政治罪行的规范；

(b) 继续并加强监视对政治犯进行的法律外审讯，保证它们符合上面(a)小段中提到的标准；

(c) 继续并扩大土地改革和司法改革，但必须符合上面(a)小段提到的标准，并以它们为改革的基础。

191. 对马蒂民解阵线部队特别代表特别建议：

(a) 他们不要放置会杀死非战斗人员或使他们受到重伤的地雷；

(b) 他们不要攻击萨尔瓦多的经济基础结构。

192. 最后，特别代表愿意建议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最富有和最发达的国家，在它们可能的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援助，减轻和改善萨尔瓦多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的人的生活状况。

注

- ¹ 1986年3月12日—16日《国家报》。
- ² 1986年6月3日和5日《国家报》；1986年6月4日和5日《世界报》；
1986年6月3日和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 ³ 1986年6月23日《国家报》。
- ⁴ 美国广播公司，1986年8月21日，马德里；1986年8月21日《国家报》。
- ⁵ 1986年9月20日《国家报》。
- ⁶ 萨尔瓦多共和总统1986年9月26日向特别代表提交的萨尔瓦多政府临时报告：“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萨尔瓦多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 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研究报告”(LC/L.390/Add.1)，第1页。
- ⁸ 同上，第8页。
- ⁹ 同上，第9页。
- ¹⁰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 ¹¹ 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司：“萨尔瓦多局势”，第7页。
- ¹²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49和第50页。
- ¹³ 美国国务院：“萨尔瓦多局势”，第7和第8页。
- ¹⁴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51—54页。
- ¹⁵ 拉加经委会，LC/L.390/Add.1，第19和第20页。

- ¹⁶ 1986年4月5日—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6年3月4日、5月3日和4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 ¹⁷ 1986年5月3日和4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 ¹⁸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 ¹⁹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63页。
- ²⁰ 拉加经委会，LC/L.390/Add.1。
- ²¹ 国防和公共安全部：“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侵犯人权事件按年月顺序及萨尔瓦多各地区开列的一览表”，第一卷，圣萨尔瓦多，1986年8月31日。
- ²² 同上，第二卷。
- ²³ 1986年3月5日《世界日报》。
- ²⁴ 1986年2月6日《新闻画报》。
- ²⁵ 1986年2月16日《今日报》。
- ²⁶ 美洲观察组织：“逐渐习以为常。杜阿尔特任职第二年期间侵犯人权的事件，萨尔瓦多人权报告补编第八号”，纽约，1986年5月，第72页。
- ²⁷ 1986年8月2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 ²⁸ 1986年2月26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年2月26日《伦敦时报》。
- ²⁹ 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司：“萨尔瓦多局势”，第2页。
- ³⁰ 1986年8月2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 ³¹ 法律保护处报告，第45—50号。

- ³² 萨尔瓦多，基督教法律援助组织：由(a) 暗杀团和准军事团体和(b) 武装部队（部队保安和民防）人员执行的任意处决，1986年1月—4月。
- ³³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 ³⁴ 根据新闻界报道1986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因政治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按类别开列：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记录。
- ³⁵ 法律保护处，第45—第50号报告。
- ³⁶ 萨尔瓦多政府：1985年9月10日至1986年5月31日期间因恐怖行为被拘禁者名单。
- ³⁷ 法律援助组织：1986年6月15日《特别简报》。
- ³⁸ 法律援助组织：1986年5月1日《特别简报》。
- ³⁹ 1986年8月26日《纽约时报》。
- ⁴⁰ 关于共和国司法部长办公室在监测和尊重人权方面采取的干预措施的报告，圣萨尔瓦多，1986年9月22日。
- ⁴¹ 1986年2月15日《纽约时报》。
- ⁴² 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萨尔瓦多：无视人权。关于16个悬而未决案件的报告”，1986年7月。
- ⁴³ 因各种冒犯居民行为被国家警察捕获并提交刑事法庭处理的武装部队成员的统计数字，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6月20日。
- ⁴⁴ 何塞·西梅翁·卡卡亚斯中美洲大学人权研究所：第一分册：“人权和第50号法令”，圣萨尔瓦多，1986年1月。
- ⁴⁵ 法律援助组织：要求宣布第50号法令违反宪法的请愿书，圣萨尔瓦多，1985年4月7日。

- ⁴⁶ 第1号初审军事法庭。 犯人名单：这些犯人因下述罪行被起诉：恐怖主义、合作进行颠覆性宣传、拥有或持有攻击性武器等，但法庭不受理这些起诉。
- ⁴⁷ 人身保护令案件数字统计表。1985年9月—1986年8月。
- ⁴⁸ 法律保护处：第45—第50号报告。
- ⁴⁹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 ⁵⁰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国防和公共安全部负责公共安全事务副部长：“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人权情况的报告”。
- ⁵¹ 法律保护处：第45—第50号报告。
- ⁵²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人权情况的报告。”
- ⁵³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6页；以及内政部于1986年9月向特别代表提供的资料。
- ⁵⁴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第39和第40页。
- ⁵⁵ 同上，第3—第5页。
- ⁵⁶ 同上，第6页。
- ⁵⁷ 1986年4月3日《伦敦时报》。
- ⁵⁸ 美国国务院：“萨尔瓦多局势”。
- ⁵⁹ 美洲观察组织：“逐渐习以为常……。”
- ⁶⁰ 萨尔瓦多政府交给特别代表的讲道稿副本。
- ⁶¹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人权情况的报告”，第6页。
- ⁶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实况报道，中美洲和墨西哥”，日内瓦，1986年8月。

- 65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人权情况的报告”，第7和第8页。
- 66 难民专员办事处：“实况报道……”。
- 67 法律保护处：第45—第50号报告。
- 68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 69 根据新闻界报道1986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因政治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按类别开列；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记录。
- 70 1986年3月13日《新闻画报》和《今日报》，圣萨尔瓦多。
- 71 1986年3月20日《纽约时报》。
- 72 1986年7月20日《今日报》。
- 73 1986年4月22日萨尔瓦多常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团普通照会所附的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的电传稿。
- 74 美洲观察组织：“逐渐习以为常……”第35页。
- 75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人权情况的报告”，第20页。
- 76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1985年全年至1986年7月期间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分子放置爆炸物品造成的平民伤亡”。
- 77 马蒂民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人权与和平。 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和政治解决萨尔瓦多问题的前景”，1986年7月1日。
- 78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从全国报纸收集的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侵犯人权事件的资料，1986年8月，附件四。
- 79 1986年8月1日《纽约时报》。

- 78 马蒂民解阵线：“马蒂民解阵线释放的一些战俘”，纽约，1986年10月8日。
- 79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人权情况的报告”。
- 80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 81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向特别代表提交的刑事调查委员会的临时报告；“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萨尔瓦多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 82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人权情况的报告”，第33页。
-